

论孙中山知行认识论蕴含的教育哲学

陈得军

(新疆师范大学 语言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 知难行易是孙中山认识论的核心思想。孙中山提倡“知难行易”, 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认识心理、国民行为、提高国民素质。反映了孙中山重视教育的作用; 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 提升国民素质, 发挥教育的工具理性; 主张心性教育, 提升民族道德修养, 发挥教育的价值理性; 提倡政治教育, 主张教育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 孙中山; 知难行易; 教育哲学

中图分类号: G4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6)04-0139-06

“知难行易”认识论是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反思, 是对中国传统“知行”理论的改革, 是痛定思痛的结果。“知难行易”认识论与革命斗争相结合, 成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思想利器。“其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说明知与行的真实关系, 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中国, 为服务于当时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活动”。^[1](P96)]主张民众积极投入到革命实践中来, 通过“力行”实现革命理想。从历史角度来说, 孙中山“知难行易”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路径的一次颠覆, 使得中国哲学研究从“求内·反省”传统思辨转向“诸外·平天下”现代哲学路径。使得中国近代哲学研究“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倾向、“全盘西学, 否定国学”倾向得以缓和, 孙中山结合中国传统及哲学, 融通西方科学及哲学, 创立了“知难行易”认识论。以往对于孙中山“知行”认识论思想的研究多数是论述认识论思想的思想基础、思想意义, 但鲜有论述孙中山认识论所蕴含的教育思想。孙中山知行认识论思想反映了孙中山对于教育的重视, 在知难行易认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教育哲学。

一、知难行易认识论

(一) 是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
探讨“知行”关系是中国先秦以来的哲学

传统, 自古有之。最早在《左转·昭公十年》中便有“非知之实难, 将在行之”, 随后在《尚书·说命》中同样提出了“非知之艰, 行之维艰”的说法。而到了宋明, 朱熹与二程分别提出“知先行后”的“知行”关系说。这便奠定了中国古代对于“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的传统看法, 一直延续至王阳明。王阳明认为道德活动要提倡“知行合一”, 以“心之本体”作为“知行本体”, “道德活动与一般认识活动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道德活动必须见诸行, 而认识活动不一定见诸行。所以在道德活动中, 知必须表现为行, 能知必能行, 在道德活动中知行相即不离, 是合一的。在知的过程中抱着‘真切笃行’的态度, 在行的过程中保持‘明觉精察’, 否则不是冥行就是妄想”。^[2](P340)]王阳明将“知行”谁先谁后的关系, 以“知行”并行的关系加以论述, 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 肯定了知的作用, 但是他依然不能摆脱“心外无物”的先验论知行关系说, 并仅仅论述了道德活动中的“知行合一”, 而忽略了实践活动中的“知行关系”。虽然王夫之沿用了“知易行难”的说法, 但是赋予了它以新的思想内容, 他认为正因为“行难”所以更应该“先行”, “知易”而后行。重新将“行”的作用提了出

基金项目: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5XJ0010); 2012 年自治区重点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重点项目(12XSQZ0310); 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中心招标课题(XJEDU040415A01)

作者简介: 陈得军(1981-), 男, 新疆石河子人, 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讲师,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年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教育学研究。

来,行可以获得知,但知并不一定能行,进一步肯定了行的作用。“王夫之知行观的前提是‘知行’相分,但知行并不是平列的。在认识论的过程中,力行、实行是主导的方面”。^{[2] (P340)}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知行关系说是孙中山知行学说的理论基础,近代科学和革命经验则是孙中山知行学说的经验基础。

(二) 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

孙中山在痛定思痛之后发现革命成功是由于全国人民“心”向往所至,而革命失败同样是国民的思想错误所误,因此孙中山认为国民心理认识问题是影响革命胜败的关键因素。“卒赖于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翻专制,创建共和。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怠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说”。^{[3] (P1-2)}孙中山便以饮食、用钱、作文、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项事物为例来说明,世间万物均为“行先而后知”“知难而行易”,行是认识的基础,只有通过行才能达到知,来唤起国人的行动意识,培养国人的实践能力,国家才能实现发展,达到文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不知亦能行,行先知后;能行便能知,以行而求知;知难行易;能知便能行,因知而进行;用行检验知。^{[4] (P378)}

孙中山结合中国传统哲学,通过对革命实践的反思,提出了“知难行易”学说,这一学说与传统知行学说虽说有前后之分,但无对错与否,只是各自侧重不同。“在古代哲学家那里,知、行范畴往往局限于对道德的体认和践履。孙中山对于知、行范畴做了新的理解。他所谓的‘知’,是指运用科学或者哲学的理性思维方法所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主要指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2] (P389)}中国传统知行观更侧重于内心追求和个人修养,而孙中山知行学说更重视科学知识、革命实践和国家发展。“中国儒家经典所说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王守仁所讲的‘知行合一’,都是就个人的修养说的。孙中山所举的‘行易知难’的例,都是就社会发展说的,两者并不是一回事。”^{[5] (P28-29)}

二、“知难行易”认识论旨在改造国民行为

(一) 提倡行,重视行的作用

孙中山强调社会和人认识的发展,认为宇宙、社会以及人的认识都处于不断的进化过程,必定经历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后达到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达到因知以进行。人认识的进化不同于物种和人类的进化,“且人类之进步,且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3] (P75)}在社会进化中,“行”是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孙中山以饮食等十事来证明,人类发展皆以“行”开始,只有经历千万人的实践,百年之行,才能达到知,知后才更有利于行。“中国人几尽忘其远祖所得知识皆从冒险猛进而来,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于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而后人之受之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故有以知为易,而以行为难,此直不思而已矣。”^{[3] (54)}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和人认识的进化便不是国人所习以为常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而是“知之维艰,行之非艰”,人类社会和认识的发展最先始于行,而后有知,知比行难。人要以行达知,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以行为基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促进社会文明。“予于是乎不得不彻底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让后知后觉者明白知难行易,而非知易行难),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扰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3] (P59)}

孙中山关于“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论述显示了他对于社会实践作用的强调。首先,孙中山肯定了经验作为社会认识的来源,“知”始“行”,实践先于认识,“所以真正的认识源泉,实际只有‘力学’和‘经验’”。^{[4] (P380)}其次,孙中山所提倡的“以行而求知,行而后知”,其实是“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认识”,^{[2] (P389)}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

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3](P75)}由此可见，“不知而行，以行求知，知难行易”，是认识的基础和基本途径，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门径，同样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促进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第三，孙中山所强调的“行”，既是“知”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途径，而且是精英的教育方式。因为“先知先觉者”能“行而知之”，“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所以，“先知先觉”者能够通过“行”来进行教育，通过“行”达到对理性的把握。

(二) 人类认识的发展，使教育成为可能

孙中山将“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3](P54)}这就是孙中山阐述的人的认识要随着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经历“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阶段。所谓“不知而行”就是指，“三代以前，人类浑浑噩噩，不识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于成周之治化，此所谓不知而行之时期也”，^{[3](P54)}这一时期人处在由草昧进入初级文明的阶段，知道“行”，也能“行”，但是不知道“行”背后的“知”，不知道科学理论，通过社会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经验，从而进入人类初级文明阶段。所谓“行而后知”就是指，“由周而后，人类之觉悟渐生，知识日长，于是渐进而入于欲知而后行之时期矣”，^{[3](P54)}人处在初级文明阶段向进一步文明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人们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知”的重要性，并且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所谓“知而后行”就是指，“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3](P55)}即现代科学迅速发展时期，科学知识逐渐普及，开始进入现代文明。这一阶段要通过教育掌握科学知识，丰富科学理论，从而更有利“行”，更善于“行”。“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3](P59)}

(三) 强调“知”的重要性：教育哲学的基础

孙中山提倡“行”，主张“行而后知”。强调只有通过行，才能获得知识。而其更重视“知”的作用，主张“因知而进行”。认为掌握了科学

知识，便能行天下之事。强调通过理性认识的指导，才能更有助于行。“知之则必能行，知之则更易行之”。^{[3](P57)}

正因为“知”更有利于“行”，“求知”便成为实践中的首要大事。在实践之前，要掌握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孙中山认为正是因为目前不知之人太多了，所以国家才积贫积弱发展不起来，革命频频受阻无法成功。“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不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6](P15)}不知之人太多，才是阻碍国家发展的最大病源。因此需要“先求知”以至“乐行”，即通过“知”促使“行”。“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3](P60)}

此外，孙中山认为知识同社会一样具有进步性。知识本身是动态的，发展的，并不是一劳永逸，不变的。“客观存在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类的认识也就不能停滞不前”，^{[4](P380)}人需要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不断积累新知识。反之，便不能达到“能知必能行”的效果。“吾人之在世界，其知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铄。是以智之反面，则为蠢、为愚。”^{[7](P17)}

孙中山所指“能知必能行”，不仅是“知”能促使“行”，还表现为“知”能指导“行”，即理性认识能指导实践。“之所以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并要使认识适应形势的发展，这是因为作为革命的指导者，他必须要用‘知’——理论来指导人们进行革命实践。所以孙中山能够理解认识不但导源于实践，更重要的是它还必须用以指导实践”。^{[4](P381)}所以孙中山非常强调“知”指导实践的作用，并把“知”看作“思想”“信念”和“力量”，掌握了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便能形成“信念”，有了信念便有了行动的“力量”，革命也就有了成功的动力。“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

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9](P861)} 因此,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能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认识自然世界。对于社会来说,知识越多,掌握知识的人越多,人类越进步,社会发展也就越快。

孙中山认为知识来源于实践,但通过实践获得的知识不一定全是科学知识,除“真知”之外便是“感觉经验”。孙中山认为认识的来源有三个,即生而知,力学而知和经验而知。有的知识是天生的,有的知识是“力学”的,有的知识是“经验”的。天生的“聪明”,不经过后天“力学”同样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李泽厚认为孙中山所强调的“真正的认识源泉,实际只有‘力学’和‘经验’”。^{[4](P380)} 孙中山所强调的知识除了经由“力学”而得来的,还有通过“经验”而得来的。“此外亦有不由天生,不由力学,而由经验得来者。谚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故所历之事既多,智识遂亦增长,所谓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于经验也”。^{[7](P17)} 这里的“经验”可以理解动词的“经验”,即孙中山所提倡的“行”和“观察”。同样可以理解为名词的“经验”,即通过行和观察而获得的感觉经验,这也是科学知识的来源。孙中山同样重视“经验”的作用,认为经验多,知识就丰富。人类的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所以感性认识应该上升到理性认识。孙中山本人也就通过不断积累革命经验而获得革命理论,认为经验越丰富,革命也能尽快成功。‘孙中山所说的‘知’实际上包括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方面的内容。他虽然没有使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概念’。^{[1](P29)}

三、教育哲学

孙中山论述了“行”“知”及其关系,并且提出生而知、力学而知和经验而知是知识的三个来源。而且肯定了“力学”的重要性。所谓“力”,就是“行”。人类社会就是不断通过“行”而进化发展的,通过“行”同样也能获得知识,达到对理性认识的把握。只不过孙中山认为“知难行易”,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知”,只有类似“先知先觉”式的社会精英才能够“行而知之”。而“后知后觉者”可以通过“模仿”而“知”。在孙中山看来,“不知不觉者”即使是“行”也不一定“知”。这里的“知”就是对世界本源的理性认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对世

界本源的认识,因而不可能人人都能成为设计者。所以,“先知先觉”者能“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后知后觉者”通过模仿“先知先觉者”的“知”,并通过宣传将这些“知”传递给“不知不觉者”;而“不知不觉者”不需要“知”,只需要懂得跟着“先知先觉者”的理论“行”就可以了。因此,要让“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更好地“行”,必须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所谓“学”,就是“学习”和“教学”,国人“必教而后学”以致“学而后知”。而这里的“知”不仅包括“科学知识”“道德修养”,还包括“政治知识”,尤其是“先知先觉者”的政治理论,通过教育引导国民参与政治,践行革命。

(一) 教育目标:教而后学、学而后知

用现代教育学知识来看,孙中山看到了先天因素、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但孙中山看中“教”的作用。“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6](P8~9)} 知识的来源虽然“由天生”,但这里“由天生”的是“聪明”,而非知识本身,“所谓知‘由天生’并非是指人类具有先天的理性和观念,而是认为人们的天赋资质不同”,^{[6](P380)} 所以孙中山强调人“不能生而知之,必待学而后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知识。因此要普及教育,重视教育。“今日文明已进于科学时代,凡有兴作,必先求知而后从事于行,则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7](P200)}

教育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首先便是教人“知”,孙中山认为知后必能行,而且知后更有利于行。所以教育的任务就是让更多不知者成为“知者”。“如教育界教人知者也”。^{[8](P567)} 其次便是提高国民素质。“立学校以育人材”。^{[6](P222)} 再次便是培养人才,使人“各尽其职”。“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6](P8)} 通过普及教育,实现教人知,提高国民素质,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使人“各尽其职”。这就是孙中山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

孙中山所谓的教人“知”包括哪些内容呢?

孙中山的所有哲学基础都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对自身革命经验的反省。孙中山教育哲学也同样受到这个文化模式的影响。孙中山认为要提高国民素质,需要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增加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教育也从单纯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工具理性取向,转向传授文化、塑造心理和引导国民参与政治的价值理性取向。“教育的工具理性与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不可分离的。孙中山在强调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同时,也认识到教育对于人格树立、个人道德的教化、社会观念引导的重要作用。”^{[10](P172)}

(二) 重视科学知识,发挥教育的工具理性

孙中山非常看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以日本为例,说明真是科学知识的进步使得日本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大国。“日本维新以后五十年来,其社会之文明,学术之发达,工商之进步,不独超过于彼数千年前之进化,且较之欧洲为尤速,此皆科学为之也。”^{[7](P200)}他也不认为仅通过坚船利炮、机器生产能根本解决中国积弱问题。人不知,没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才是造成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孙中山主张在中国普及科学知识,培养人才。“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而国以强;否则反此。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6](P2)}因而孙中山认为兴建学校,发展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业、农业、商业、建筑、机器科学、电的知识、化学和医学等均属于科学知识的范围,都应该普及、教育。“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论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11](P530)}提倡学校要教给学生科学基础和学理,为将来革命事业、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奠定基础。“当此建设之始,需才孔急,量才器用,各尽其长。大才有大用,小才有小用,只要有真正学问,不愁没有用处的。况且事业已告成功,从前希望均已达到,将来只希望,即是建设事业。”^{[13](P24)}

(三) 主张思想教育,发挥教育的价值理性

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国民科学素质依然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孙中山开始尝试教育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倡教育在革命中的作

用。主张“心”性思想教育。1905年孙中山为东京军事训练班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6](P224)}誓词,以此磨炼学员心智,激励思想。“孙中山已经注意到教育的工具理性不是孤立的,它必须由价值理性来引导,如果缺少了价值目标,工具理性的发挥也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10](P171)}

随着革命的推进,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痛定思痛之后撰写了《建国方略》以谋求治疗国民的心理疾病,使得国民在思想上树立“知难行易”的“力行”哲学,以求鼓励国人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力行”促进革命的发展。

孙中山同样指出,道德对于政党和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对于政党来,成员的道德高低直接关乎政党的力量和长久,因此革命党人要有高尚的品德,否则如果革命党人没有党德,不仅使得政党不能“长存”,同样会耽误了国家前途,“倘使丧失党德,则国家前途无限危险。”^{[13](P37)}对于组成国家的国民来说,如果人人都有道德,那么,国家便能发展。“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12](P319)}如果政党成员有道德,政党便能长久。如果政党想引领国人救国,必要塑造国人好的人格,加强道德教育。具有高尚人格的个体,不仅是改良国家的手段,而且是建设国家和国家政治进步的条件。“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4](P250)}修身是齐家的基础,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同样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孙中山认为不仅要提高国民道德修养,而且也要塑造民族精神。这个关键便是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学习,“所以中国以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的旧道德”是“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要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的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14](P247)}孙中山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精神,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精神,即孙中山提倡的人类进化的“互助仁爱”原则,将以此德塑造成民族精神,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进一步提出,通过“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12](P580)}

来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国人和民族道德修养,是革命成功、国家发展的基本途径。其次还需要学习欧美科学技术知识,“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习欧美之所长,然后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4](P251)]

(四) 主张政治教育,教育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孙中山认为人人都需要参与政治,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夫在学生时代,政治虽若与己身无关,而政治之理想与智识,实为学生要素,乏兹要素,而谓将来能救国者,未之敢期也。”^[1](P580)] 政治理想和政治能力,是学生将来参加革命、发展国家的必要素质,而且政治能够改造学生心智,提升学生道德和人格。“政治的力量,足以改造人心、改造社会,为用至弘,成效至著。孔子以政治为第一要务,而今之教育家辄舍政治而不谈,何为?”^[8](P564)] 因此教育家要敢于谈论政治,培养政治修养。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参与革命。政治不仅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力量,同样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力量。“诸君乃教育家,须知教育者,乃引导人群进化者也。然能令人群进化最速者果何力乎? 则政治的力量也。政治是促人群进化之唯一工具,故教育家当为政治的教育家。”^[8](P563)] 孙中山看到了教育对政治和革命事业的促进作用,提倡学生参与政治,培养学生政

治理念。教育要促进学生成为革命的力量,践行革命。以此孙中山提倡教育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教育成为推动革命的力量。其次还看到了政治对于教育的反作用,认为教育的进步是以政治为基础的。“教育进步,以政治为基础。试观日本教育比中国进步甚多,考其故,则以日本政治良好。”^[8](P565)]

参考文献

- [1] 韦杰廷. 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2] 郭齐勇. 中国哲学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3] 孙中山. 建国方略 [M]. 牧之,方新,守义,选注.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 [4]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M]. 北京: 三联书店,2008.
- [5] 冯友兰. 中国现代哲学史 [M]. 北京: 三联书店,2009.
- [6]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 [7]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 [8]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 [9]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下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
- [10] 韩剑锋. “裕民、齐民、新民”——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研究 [M]. 天津: 南开大学,2012.
- [11]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十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 [12]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八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 [13]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 [14]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Contained in Sun Yat – sen’s Epistemolog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CHEN De – jun

(School of Languag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Sun Yat – sen held that it is easier to do a thing than to know the why, which is the core thought of his epistemology. This advocacy was made mainly to improve the mentality, behavior and quality of the people.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thought reveals the following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his: firstly,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education; secondly, he emphasiz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nation and play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education; thirdly, he advocated character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morality of the nation and play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education; finally, he promote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favor of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ary practice.

Key words: Sun Yat – sen; difficult to know and easy to do; educational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李 官)